

北大讲座书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卷

站在巨人的肩上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北大讲演集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编

◆ 詹姆斯·赫克曼 ◆ 罗伯特·福戈尔 ◆ 道格拉斯·诺斯 ◆ 罗伯特·蒙代尔
◆ 詹姆斯·莫里斯 ◆ 阿玛蒂亚·森 ◆ 斯蒂格利茨 ◆ 弗农·史密斯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大讲座书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卷

站在巨人的肩上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北大讲演集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编

- ◆ 詹姆斯·赫克曼 ◆ 罗伯特·福戈尔 ◆ 道格拉斯·诺斯 ◆ 罗伯特·蒙代尔
- ◆ 詹姆斯·莫里斯 ◆ 阿玛蒂亚·森 ◆ 斯蒂格利茨 ◆ 弗农·史密斯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站在巨人的肩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北大讲演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9

ISBN 7-301-07716-5

I. 站… II. 北… III. 经济学-演讲-世界-文集 IV. 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9175 号

书 名: 站在巨人的肩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北大讲演集

著作责任者: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编

责任编辑: 陈 莉

标准书号: ISBN 7-301-07716-5/F·090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em@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926

排 版 者: 北京高新特打字服务社 51736661

印 刷 者: 河北三河新世纪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2 印张 186 千字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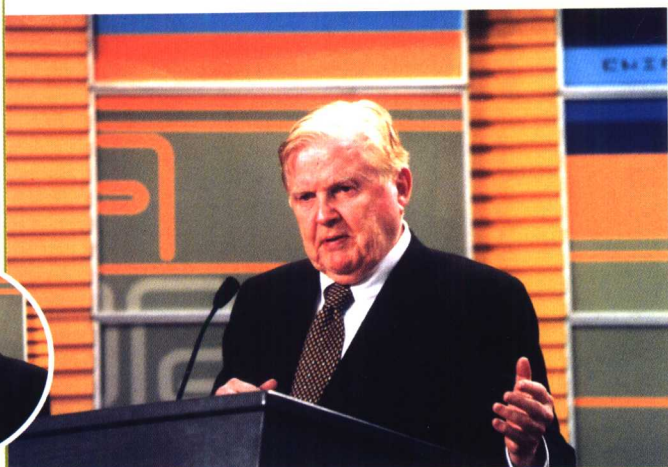


2003 年 12 月，诺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教授在北大演讲。



2004 年 6 月，诺奖得主罗伯特·福戈尔教授（中）在北大演讲，（右一）为林毅夫教授，（左一）陈平教授。

SBK 79, 200



2003年3月，诺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教授在北大演讲。



2003年12月，诺奖得主弗农·史密斯教授（左一）在北大演讲，
（右一）为林毅夫教授，（右二）为海闻教授。



2003年3月，诺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教授（左二）在北大与林毅夫教授（左一）、海闻教授（右二）、吴志攀教授（右一）合影。



2003年12月诺奖得主弗里德·史密斯教授与林毅夫教授在交谈。



2002 年 3 月，诺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教授在北大演讲。



2002 年 7 月，诺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教授在北大演讲时，与林毅夫教授在交流。



2003 年 12 月，诺奖得主弗农·史密斯教授与中心部分老师合影。



2001 年 10 月，万众苑落成时，罗伯特·蒙代尔教授在北大演讲。



1998 年 7 月，诺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在北大演讲。



1997 年 4 月，诺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教授在北大演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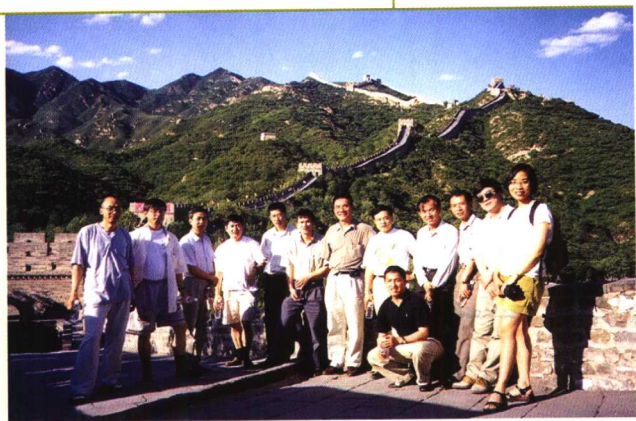
1999年6月，罗伯特·福戈尔教授与中心部分老师合影。



1999年6月，林毅夫教授向罗伯特·福戈尔教授赠送纪念品。



2003年6月，中心部分老师合影。



2002年6月，中心部分老师合影。

序 言

陈 平

中国运动员在最近的雅典奥运会上夺得的金牌累计过了百枚,这当然使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大增。越来越多的大众和媒体在和经济学家的讨论中提问:中国人离诺贝尔经济学奖还有多远?回答这个问题,也许可以帮助大家明白我们举办系列讲座的初衷。

奥运会的竞赛项目多数是西方人制定的规则,非西方人的项目只有日本的柔道、韩国的跆拳道等不多的几项。中国人的国技如武术等尚未成为国际比赛项目。就此而言,中国体育的“赶超”阶段已经接近胜利,但流派以至项目的创新才刚刚开始。和中国体育健儿的进步相比,中国经济学家要走的路还更远。

虽然中国的经济思想有悠久的历史,但经济学成为独立的科学历史却很短。从五四运动到改革开放,经济学大致还在引进、传播和应用的阶段:先是从俄国,然后从英美引进,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目前学校教授的经济学的确可以称作“西方”经济学,因为除了注释解说之外,内容上很少有中国经济学家的真正贡献。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都是政治家而非经济学家主导。“以吏为师”是中国的学术传统。至今中国若干名校的经济管理学院还争聘现任政府官员作院长,而非政府首脑礼聘经济学家做决策顾问,中国经济学界的差距可见一斑。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建立的第一个初衷,就是建立和国际接轨的严格科学的学术规范,摆脱传统中国文人做谋臣策士的附庸地位,中国经济学界才有健康发展的平台。为此中心全面引进符合国际标准的英文教材,创办接近国际标准的《经济学(季刊)》。但是提升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水平却需要更多的努力。举办研讨会,请包括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的经济学大师级学者来访,都是中心有目共睹的努力。

中国学者和学生,从仰望大师的风采,和大师们平等的对话,到将来能

否站在巨人的肩上,做出自己的贡献,关键何在呢?我只想从个人的观察与体验出发,提出三点建议与大家探讨。

第一,要从全球和历史的角度来探讨中国问题。

中国近百年来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邓小平的改革观念对世界格局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近代中国人没有在经济思想上产生世界级的学者,原因之一是中国的志士仁人太关注中国事务,而忽视世界大势。所以,中国的发展不但走了不少弯路,中国的经验也难以上升为世界主流学术的一部分。就此而言,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们对中国问题的讨论,可以给国人许多有益的启发。

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中,没有人是中国问题专家,也很少在政府部门任职。为什么大家依然想听他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评论?因为他们往往超越政府官员与中国专家的具体见解,更关心对策背后的长期远景与基本问题。例如,中国自大跃进以来,一再出现浮夸风,却从未找出防止浮夸的体制。赫克曼在和中心教员的座谈中,强调建立客观独立的统计系统的重要性,否则经济学家将失去定量评价政府政策效能的依据。这一根本大计,值得中国政府和学界认真对待。蒙代尔在讨论中国的汇率问题时,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意见相反,不仅支持中国目前的稳定汇率政策,而且认为日本经济要走出困境,应当放弃浮动汇率,走向固定汇率。阿玛蒂亚·森把个人发展的自由度而非 GDP 作为经济发展的指标,更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我曾问过他,有无适当自由度的问题,因为富裕国家的少年自由太多,也会成为社会问题,个人的有界理性不可能处理太大的自由度。这个问题至今数学上难以建模。这对发展中国家的“小康社会”理论,也有重要意义。这些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与政策问题,值得中国的学生与学者研究与深思。

第二,要注意大师们对经济学基本问题的关注。

中国文化的一个弱点是重技术,轻理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尤其热衷引进先进的设备与流行的观念,却忽视基本问题的提出和关注。任何科学的重大变革,首先来源于对新现象的观察与新问题的提出,而非现有问题的重复与改进。中国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不少经济学家引进和宣传以科斯为首的产权学派的工作,却很少看到从中国的改革实践中,对企业理论的改进与创新。我在和几位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的讨论中,获得了意外的收获与启示。

已故芝加哥大学的获诺贝尔奖的金融学家默顿·米勒在中国留美经济

学会有关国企改革的研讨会中说:产权当然重要,但没有最优解。简而言之,英美型短期行为投资不足,德日型长期行为投资过度。虽然他个人偏好英美型产权,但他不认为英美模式为最佳选择[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 2002 年第 22 期(总第 309 期) 2002 年 5 月 10 日《张五常教授谈需求定律等问题》]。他的观察与演化经济学家和实验经济学家不谋而合。我和已故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曾经争论过一个理论问题:劳动分工的发展过程中,交易成本究竟是增加还是减少?杨小凯从科斯定理出发认为肯定减少,我从非平衡热力学的原理和中国改革过程中学费与医疗费急剧增加的观察出发认为肯定增加。我为此问题的经验证据请教过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史学家福格尔和诺斯。福格尔认为此问题很复杂,从电讯的消费者角度分析,也许可以认为交易成本在下降。诺斯从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度量出发,证明美国 1870 年的社会交易成本约占 GDP 的 25%。但到 1970 增加到 50%。我的理解是:一般趋势是每项交易的交易成本比例由于技术竞争而有所下降,但由于交易规模扩大所需的社会监督与协调成本增加,所以总的社会交易成本增加而导致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增加,其最终趋势是否是导致发达国家产业外移的原因还有待观察。[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 2002 年第 13 期(总第 300 期) 2002 年 4 月 2 日,《改变中的经济 and 经济学》——诺斯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讲演和讨论录]。为此,我同意张五常和科斯争论时的看法:企业理论并未完善而是刚刚开始,因为经济学家甚至不能解释企业的边界何在。所以中国在处理社会协调发展时,要选择性地实行市场化,而非盲目地全面市场化。至今发达国家在教育、医疗和基础科学的市场化问题上并未达成经验的共识。我个人赞同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看法:世界上只有适合不同国情的“混合经济”,没有纯粹的“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学家在改革理论的探索上,应当比匈牙利的转型经济学家科尔奈走得更远。

第三,要注意经济研究方法的创新。

林毅夫教授在鼓励中国学生时喜欢引用弗里德曼的话:“谁能解释中国经济,谁就有可能得诺贝尔奖”。我想做一点小小的补充:诺贝尔奖只会奖给用新方法解释重大问题的学者,不会奖给用老方法验证已有理论的工作。中国目前的科学少有方法的创新,原因之一是太关注结果的模仿与结论的合群,而忽视方法的创新与思路的变革。我们请来的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例如福格尔与赫克曼,他们的获奖主要就在于他们提出新方法去解决老问题。

科举制至今在中国有重大影响,问题不在于考试制度本身,而在考试选拔的标准与方法。弗里德曼的回忆录中说他给芝加哥大学学生的作业,很多是他自己也不知道答案的开放问题,以鼓励学生的创新。但我在北大任教期间,发现北大普遍推崇高分学生而非创新才能,造成追逐名家而非追踪前沿的风气,兼容并包而无竞争淘汰,非常不利于科学传统的成长。我个人受林毅夫教授委托,多次接待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从和他们的交往中学到比参加美国经济学会年会多得多的宝贵经验。例如,赫克曼从微观数据的研究中,质疑卢卡斯的代表者模型与一般均衡理论在解释微观失业数据时的有效性,与我从宏观经济数据和大数原理出发的分析,否定理性预期与微观基础说不谋而合。我做宏观经济学研究达20年,在此之前却从未想到过和微观经济学家对话与合作。诺斯研究文化与制度的关系,和斯坦福的心理学家合作做《最后通牒》的经济实验,用到弗农·史密斯的重要成果。我认识弗农·史密斯也近十年,虽然在国内多次宣传实验经济学与文化人类学之重要,却未能及早引起中心同事们的注意。这不仅是个人的过失,也说明缺乏交流竞争的中国经济科学与世界水平的差距。

经济学的诺贝尔奖比自然科学更难以判断,到目前为止获奖的大多是30到40年前发表的工作。多数获得诺贝尔奖的工作,并未写进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举例言之,我们在教宏观经济学的货币政策时,一直用教科书的办法把大国的货币政策当做封闭经济来处理。蒙代尔在他的讲演中告诉我们:早在肯尼迪执政的20世纪60年代,托宾与萨缪尔森按照新古典综合的凯恩斯派模型提出的经济政策就是失败的,因为那时的美国经济已不能视为封闭经济。他的开放系统的货币政策与汇率模型,受的是他老师萨缪尔森动力学稳定性分析的启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的工作虽然获得诺贝尔奖并导致欧元的诞生,但至今还未能取代主流宏观经济学过分简化的通俗教材。假如北大这样重要的中国大学的研究生依靠教科书而非经典与前沿论文来指导,则中国经济学与世界的差距至少为30年。这是我为什么十分主张在北大推行国际上一流研究型大学早已采用的“研中学”的方法,强烈批评国内教学型大学片面强调“打基础”或“学后研”的传统的主要原因。我们读诺贝尔奖得主的传记时不难发现,多数革命性的发现者都是知识不多的研究生或青年人。要知道,科学的新陈代谢很快,知识是力量也是包袱。独立研究的精神要从低年级大学生开始培养。

我希望中国有志于经济学的年轻人,在阅读本文集时,不要满足于成为诺贝尔奖经济学家的追星族,而要有勇气学会做挑战前人的探索者。前

人探索的出发点是科学的观察与兴趣,或是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不是个人的功成名就。学习过程中要注意分析,前人成功的基石,也就是后人突破局限的出发点。后来人只有注重科学研究的观察、提问与方法,才有可能站在巨人的肩上,而非拜倒在巨人的旗下。如此,中国的经济研究方能和中国的经济发展一起步入世界民族之林。望下一代中国经济学人比我们这一代走得更远。

2004年8月25日凌晨于美国 Austin

目录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发展和批评 \ 1	罗伯特·蒙代尔
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 \ 12	詹姆斯·赫克曼
市场、资本市场、全球化 \ 30	弗农·史密斯
经济增长性质的变革 \ 49	罗伯特·福戈尔
资本主义与经济增长 \ 69	道格拉斯·诺斯
制度变迁理论纲要 \ 80	道格拉斯·诺斯
改变中的经济和经济学 \ 86	道格拉斯·诺斯
20 世纪美国经济的变迁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 92	罗伯特·福戈尔
全球经济增长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 103	罗伯特·福戈尔